编者按

近日，由公安部主办的“阳光下的守护”法治公安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浙江绍兴、福建厦门、上海，感受当地人民警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当地公安机关在提升执法质效、护企优商、助力乡村振兴、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采访。

浙江省诸暨市贵兴救援队：

无畏慈心济苍生

袁炯明展示贵兴救援队无人机救援装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摄

贵兴救援队参与抗洪救灾。 贵兴救援队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

52岁的袁炯明现任浙江省诸暨市贵兴救援队队长。他身体健壮，曾是一名马拉松运动员。

“以前在参赛过程中经常目睹跑友受伤，我们在旁边却束手无措。”这份担忧，让袁炯明萌生了学习专业救援知识和创办民间救援队的想法。

在袁炯明带动下，贵兴救援队初创于2016年，并于2019年注册成立。贵兴救援队成立后曾参与安徽六安水灾、河北涿州特大洪涝灾害、甘肃积石山地震、土耳其7.8级特大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

近日，“阳光下的守护”法治公安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贵兴救援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贵兴救援队现有队员200余人，主要由热心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教育、文化、艺术、医卫、媒体、个体户等专业人士组成。这支队伍成立至今已承担救援任务千余次，一次次以无畏慈心救援生命。

“要对所有装备像生命一样爱护”

贵兴救援队成立后，队员们陆续学习了心肺复苏、AED使用、伤口包扎等专业知识。具备初步的医疗救援条件后，他们便开始救助一些在马拉松参赛过程中受伤的运动员。

随着救助的范围和频次变广、变多，也助推这一救援组织向更专业、更全面的方向发展。

作为创始人，袁炯明对自己的专业要求极严。他曾奔赴北京、永康、富阳等地参加各种专业救援培训。目前，他拥有山地救援证、水域救援证、地震救援证、森林消防资格证等在内的8种救援资格证。队员们也全部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培训，分别拥有不同方向的专业资格证书。这也为贵兴救援队一次次救援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进贵兴救援队装备库，门头赫然贴着“要对所有装备像生命一样爱护”的大字。装备库分类细致、装备齐全，5间库房分别存放着森林消防、水域救援、地震救援、山地救援、抗疫物资等装备。

这些装备包含充气式救援千斤顶、高功率马达冲锋舟、地震破拆装备、蛇眼生命探测仪、蜂鸟声呐探索器等专业设备，覆盖水陆空三大救援领域和场景。

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救援组织，为何要配置如此“高、精、尖”的装备？这让袁炯明想起往事，他眼含泪光说：“几年前刮台风，我们参与了一次救援行动，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被房屋巨大的横梁压得不能动弹，因为缺少专业的救援装备，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她慢慢失去生命。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这件事对袁炯明触动极大。后来贵兴救援队购买专业装备时，总是竭尽所能，他甚至卖掉了创办贵兴救援队前自己就买的一辆心爱的好车，换成一辆3万多元的二手车开。

一次，在抗洪救灾转移群众时，贵兴救援队发现没有适合小朋友穿的救生衣，于是购置了一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救生衣；在上山寻人时发现队员所能探索的地方太局限，救援队于是购置了热成像无人机……

贵兴救援队业务职能包括地震救援、山地救援、水域救援、潜水救援、自然灾害救援、应急通信救援、安全生产事故救援、意外事故救援、森林消防、防灾减灾培训宣传、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保障等。

在多次救援中，贵兴救援队根据不同场景和需求，购买了全面的救援设备，时刻为下一次救援行动做好准备。

“一年的时间里，装备360天可能都放在仓库里，但只要一次用上了，就是拯救生命的关键，是我们救援队的价值所在！”这是贵兴救援队的信念。

“雪中送炭，冬日暖阳”

作为救援队队长，袁炯明的救援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在一次次救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寻人救援时，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往哪个方向展开搜救？在哪块区域实行地毯式搜查等，他都要凭借细节和经验快速作出指挥决断。

“在我参与的所有救援行动中，指挥正确率可以达到80%以上。”这份自信，来自袁炯明参与的上百次搜救抢险行动，他因此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搜救寻人经验。

2021年新年第一天，诸暨市公安局浬浦派出所接到上海驴友的报警电话，他在爬诸暨当地东白山时不慎摔断腿，被困在半山腰。

接到报警后，民警火速出发，同时联系了贵兴救援队协助。

当时，袁炯明正准备出门跟朋友吃饭。电话里，袁炯明一听对方是外地人，还受了伤，他立马开车和救援队的队医一起上山。同时，其他队员也带上冰爪、担架、医疗包快速往山上赶。

“位置不难找，难的是上山和下山，车子显示零下8摄氏度，山路上全是冰冻，好几个队员都摔了。”袁炯明回忆说。他和队医先轻装上山，还好这位驴友只是骨折，等民警和救援队员带着装备赶到后，队医给受伤驴友进行了包扎。

然而，最让人犯愁的是下山的路。这段路走得十分艰难，民警和救援队员联手，在平路上用担架轮流抬150斤左右的驴友，在结冰、窄小的路面就轮流背他。大家还砍了毛竹抓在手里，走路时前后照应……

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

上海驴友出院后，给贵兴救援队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道：“雪中送炭，冬日暖阳”。如今，这面锦旗挂在贵兴救援队会议室一面墙上最中间位置。在袁炯明眼里，这面锦旗“最令人难忘”。

贵兴救援队在具体开展救援时，意外之事总是难免。

2020年7月，作为诸暨市派出的3支公益救援队之一，贵兴救援队前往安徽省六安市抗洪抢险。

当时，现场水势浩大湍急，随时可能把人冲走。

“受灾群众站在家里的桌子上、椅子上，等待我们的救援转移。”袁炯明回忆道。

洪水中断了正常通信。9名救援队队员互相约定：每隔半小时必须回指挥处报到。但在救援第二天下午3点，有两名首次参与大型抢险救灾的队员一直没有回来报到。

袁炯明站在岸边，拨通了一个队员家属电话，又立马挂断。他眼泪流不出来，脸色惨白。

“当时连跳下去的心都有。”袁炯明说。其余队员开始沿河岸搜寻，却始终找不到失踪队员的任何踪迹。直到下午5点左右，有人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地方此刻正在转移受灾群众。

袁炯明赶到那里一看，正是那两名队员！

原来此处因为受灾群众多，而水道狭窄、水势增长极快，两名队员只能争分夺秒地尽可能多转移一些人。

“我作为队长，肩上还担着全体队员的生命和安全，我们一定要整整齐齐地去，再一个不少地回。”这一场虚惊过后，贵兴救援队加强了对队员的遇险危机预警和安全教育。

“在土耳其救灾时，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大地震，无数建筑毁于一旦，许多人被废墟掩埋。

2月8日晚上9点多，贵兴救援队的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招募信息。不到一小时，群里就收到了60多条队员报名信息。

土耳其震区情况复杂，环境极其恶劣，救援难度非常大。为此，贵兴救援队根据报名队员们的持证情况、地震救援经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队员人选。

经过一晚上紧急讨论，贵兴救援队确定了一支由11人组成的小队赴土耳其参加救援。

这11个人个个“身怀绝技”，在这次救援任务中有着明确分工。其中，袁炯明担任队长，负责总指挥及与当地政府对接，其余负责现场后勤、医疗保障、统筹协调、现场指挥等工作。

考虑到这次出国救援面临的艰巨和危险，临行前，袁炯明悄悄写下了遗书。

“这份遗书现在还在家里保存着。”袁炯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2月10日，这支救援队飞往土耳其，这也是浙江绍兴首支成建制参与土耳其地震救援的社会救援队。

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飞行与辗转，队员们顺利抵达土耳其阿达纳机场，经向联合国报备，获得国际城市救援编号——CHN13。

在详细了解灾区情况后，救援队队员马不停蹄前往本次地震震中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

当时，当地气温已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的供电系统，没有路灯，一片漆黑。映入队员眼帘的只有一堆堆地震后留下的废墟。

简单整顿后，大家联合其他救援力量展开营救。

当地时间2月13日上午，救援队通过生命探测仪测出在废墟下5米左右处有生命体征，历经10多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幸存者。

“找到她时，她向我们眨了一下眼。”袁炯明回忆，这名10岁小女孩叫艾卡·塞布尼，她被压在废墟下178小时了。

此次救援，贵兴救援队救出幸存者1名，搜寻到罹难者30人，共计31人。救援中，队员们吃饭主要靠喝瓶装水、啃面包。

“那时能有一碗热水泡方便面，都会觉得很香。”袁炯明说。

从出发到回国一周时间，袁炯明瘦了5公斤。回国后，袁炯明的姐姐看到他又黑又瘦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

“在土耳其救灾时，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从土耳其回国后，贵兴救援队自发募捐，为被救的土耳其小女孩捐款24166元。同时，贵兴救援队也在内部专门成立了国际救援小组。

贵兴救援队先后获得诸暨市人民政府集体三等功、绍兴市“AAAA级社会组织”、诸暨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荣誉，袁炯明个人也获得了“绍兴好人”、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等荣誉。

面对荣誉，袁炯明说：“今后，我们贵兴救援队将向更全面、更专业的救援方向发展，让更多的善良和勇敢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绍兴公安：解纠纷巧借“洋娘舅”

李天明（中）在“洋娘舅”调解室进行调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

6月27日下午，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移民事务服务站一间“洋娘舅”调解室内，40岁的黎巴嫩商人李天明（中文名）穿着印有“洋娘舅调解员”字样的蓝色马甲，娴熟地用中英文进行调解工作。

李天明的座椅背面墙上，写着“洋娘舅”调解室的宗旨：“公正，互信，和合，共融”。他的座椅左侧一面墙上，除了挂有9名“洋娘舅”调解员的国籍和照片外，还张贴着“洋娘舅”调解员的工作方法：“巧调解，争端息，情谊留”。

这已是李天明今年参与调解的第4起涉外商业纠纷。

当天，李天明的调解对象一方是中国商人王先生，另一方为来自孟加拉国的客商贾巴尔。

这是一起因布料供货产生的生意纠纷。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在柯桥”。绍兴市柯桥区因布而生、因布而兴，坐拥亚洲规模最大的中国轻纺城，全球近四分之一纺织品在这里交易。

3个月前，贾巴尔向王先生采购了一批布料，因布料颜色与原单不符可能影响销路，有了退货的想法，但王先生坚决表示不同意。

眼看合作面临泡汤，情急之下，双方找到了柯桥知名的“洋娘舅”李天明。

李天明来中国近20年，是一名“中国通”。2018年，他加入柯桥“洋娘舅”调解队伍，已参与调解纠纷多次，调解经验丰富。

“生产方把颜色做浅了一点，采购方在出货时没有及时确认布料颜色。双方都有责任，咱们可不可以各让一步？”李天明在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调解后发问。

“为了今后长期合作，我同意让一步！”王先生爽快表态道。

“我同意您说的，不退货了。”贾巴尔回答。

……

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这让李天明深感欣慰。

最终，在李天明的调解下，王先生与贾巴尔达成“共担损失”的方案。同时，由贾巴尔承担的一半损失，也转化为下次与王先生合作的定金。

至此，双方握手言和，生意继续。

当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调解现场注意到，这间“洋娘舅”调解室的墙上，还挂着“洋娘舅”四条“工作机制”：

语言沟通与翻译：将外籍当事人的商业术语、专业表述准确地翻译给中方调解人员和当事人；

文化解释与理解：向调解团队和其他当事人解释境外当事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帮助各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差异，减少因文化冲突导致的矛盾升级；

纠纷调解与协商：积极参与纠纷的调解过程，运用自己的沟通技巧、调解经验和专业知识，协助当事人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法律宣传与教育：向境外当事人宣传中国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帮助其了解在中国解决纠纷的法律途径和程序，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调解是纯义务的！”在李天明看来，除了语言上的优势外，他当“洋娘舅”调解员的优势还在于，“我们外国人和外国人沟通可能更容易一些，而中国人和外国人沟通有时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我也是做生意的人，柯桥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来帮忙调解也是应该的。”李天明说。

事实上，李天明的调解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他也有过“调解失败的案例”。

李天明回忆：一次，一名外国商人在和一名中国商人签完合同后，到期不拿货，却一直说货物质量有问题。“后来我们查了，实际上中国商人的货物质量没问题，就是那名外国商人没钱了，没法来中国。”

李天明叹气道，“有时候，矛盾纠纷真的是避免不了”。

李天明对实在调解不了的纠纷，也会求助于当地的律师朋友。他会打电话很诚恳地告诉对方，“我有这么个案子，现在调解不了，接下来怎么处理，还是你们律师来接吧！”

除了自己当“洋娘舅”，李天明还介绍了一位叫阿德的巴基斯坦朋友加入了“洋娘舅”队伍。

39岁的阿德在柯桥做生意之前，曾在绍兴市一家医院干过外科医生。他至今走在街上，还能遇见以前的患者赞扬他“缝针缝得不错”，这令阿德非常开心。

有着3年“洋娘舅”调解经验的阿德还对比称，在自己的家乡，人们也会请有威望的长者出面调解纠纷，双方常把各自物品抵押在调解人处，“如果一方不履约，抵押物会赔给另一方”。

作为“国际纺都”，柯桥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布商在此就业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矛盾隐患也随之出现。特殊的产业背景，也让轻纺市场联勤警务站直接承担着护航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

针对市场涉外人员语言沟通、风俗习性差异等问题，警务站引入“洋娘舅”调解团队，在老乡的有力“撮合”下，众多涉外矛盾纠纷也随之化解。

据轻纺市场派出所所长孔越标介绍，为妥善化解日常经营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轻纺市场联勤警务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还与多家商会建立健全共富、共治联动机制，组建商会联盟，让商会成员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水平。柯桥现有异域商会25个，行业商会15个，会员近1万名。这1万名会员中有70%以上人员从事与纺织有关的产业。

来华近20年，李天明见证了轻纺城从“河边小街”到“国际纺都”的飞速发展。

热爱中国文化的李天明曾在绍兴文理学院就读。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认识了现在的中国媳妇。

一路走来，自称是“新柯桥人”的李天明已在柯桥安家。他从在绍兴干翻译、打工到自己创业，如今，他还有了自己创办的设计公司，主要经营与布料相关的跨境电商生意。

“我们跟出入境、商务局、市场监管等部门经常有座谈会。通过聊天，我们对这里的政府部门有了更多的了解。”谈及绍兴的营商环境，李天明说，“它是一个‘小地方’，但又是一个‘大城市’，这里什么都方便！”

浙江的“洋娘舅”经验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涉外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通过吸纳外籍人士参与调解涉外纠纷，有效破解了语言、文化差异等难题。如今，“洋娘舅”经验正成为浙江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传播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理念的特色品牌。

厦门模式：引入第三方机构 护好涉案件财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

“这里存放了多少辆车？”

“194辆！”叶文同对刻在心中的数字脱口而出。

叶文同是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每次走进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涉案车辆存放区，他都要好好转一转。

在这里，涉案车辆整齐停放。其中，一辆线条流畅的黑色跑车因位于入口处最左侧显眼位置，叶文同每次会特意多看一眼。

这辆格外引人注目的跑车背后，牵涉到一桩精心设计的骗局。

2021年12月至2023年8月，犯罪嫌疑人李某利用在厦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之便，借经营二手车交易、车辆质押贷款为由，通过租赁其他车行的车辆冒充借款方抵押物、盗用他人车辆照片伪造质押信息等手段，诱使多人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骗取多名受害人巨额钱款。

随着案件尘埃落定，这辆作为犯罪所得和重要物证的跑车被当地警方依法扣押，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接受规范、精细的全流程管理。

涉案财物从被扣押那一刻起，便进入“涉案财物保险箱”

涉案财物，指的是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刑事案件和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依法扣押、扣留、查封、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的财物，以及由公安机关负责保管的先行登记保存的财物。这些财物兼具证据属性，是重要的诉讼证据，在诉讼过程中不可或缺。

近日，“阳光下的守护”法治公安主题采访走进厦门，探访涉案财物管理中心。该中心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布塘中路6号，是一处独门独院场地，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753平方米，分为A、B两栋建筑，其中A栋为仓储楼，B栋为管理楼。

记者注意到，这里有一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团队在对涉案财物进行线下日常管理，贵重物品区的门禁需要两名工作人员指纹验证后才能进入，每件涉案财物都有一个相当于“电子身份证”的二维码……

涉案财物管理中心配置管理团队、仓储组、运输组和安保组。在这里，涉案财物管理从“分散式”管理向“集约化”管理转变，办案单位无需考虑运输、存放、管理、评估拍卖、销毁等问题，仅需通过线上平台点击指令，由第三方提供上门取件、物流转运、集约处置等服务。

针对电子元器件等需要防潮的涉案财物，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特别设置了冰箱进行存放；这里还设立了专门的手机存储柜和平板电脑存储区。截至目前，该存储区总共存放了手机2.4万余部、平板电脑1600余台。这些设备均来自各类案件，如电诈案件等。

同时，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提供“端到端”全流程服务，实现涉案财物“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交接环节全程监控、录音、录像，数据实时上传；对涉案财物采用定制包装，封口处采用一次性封口材料，如一次性封签，并“一物一码”。

“如今，从涉案财物被依法扣押的那一刻起，便进入了这个‘涉案财物保险箱’，每一步操作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其价值也得以最大限度保全。”叶文同说。

打造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涉案财物，是执法办案中“人、事、物”三要素之一。随着时代发展，涉案财物逐步呈现出种类多、形态各异等特征。如何妥善管理这些涉案财物，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执法办案部门。

叶文同介绍，近年来，厦门市公安局联合市财政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在国内率先打造“线上线下结合、企业政府配合、系统集成一体、部门联通共用”的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厦门模式”，建设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实现“物品集中管理、信息网上流转、中心集约处置”。

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创新政企合作模式，打造统一的大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实现了涉案财物管理服务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升级。

实际运行中，涉案财物管理中心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为涉案财物提供统一管理、存储、维护、网上拍卖等服务，并出台了相应的管理维护规范和责任清单，明确公安机关与第三方机构在各个环节的责任。

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根据功能设置了车辆存储区、恒温恒湿区、贵重物品区、智能存储区、远程示证区等，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全方位保障涉案财物安全。

在制度保障方面，厦门市公安局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检察院、法院、财政局等部门，出台了《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办法》《厦门市刑事涉案车辆先行处置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从机制原则、信息录入、保管流转、集约处置、职责监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涉案财物跨部门规范管理提供有力指引和支撑，确保涉案财物从扣押、收缴、查封、移交到处置都有据可循、有法可依。

引入第三方机构，“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我们为所有保存的涉案财物设置‘电子身份证’。每一件涉案财物都有一个对应的二维码编码，通过扫码，即可全程跟踪去向，全流程可回溯，实现了涉案财物的全流程监管、集约规范处置。”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综合科科长陈仲怡指着屏幕介绍道。

这背后是厦门市公安局研发应用跨部门的涉案财物智能化管理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高效对接，涉案财物的处置实现网上流转，简化实物移交的繁琐，推动涉案财物全流程精细化、数字化管理。

陈仲怡介绍，在分类管理方面，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引入第三方机构，为涉案财物提供统一管理、存储维护、网上拍卖、开展鉴定、集中销毁等服务；出台涉案财物保管维护规范，分类制定责任清单，拧紧涉案财物管理各环节“责任链”。

面对物证鉴定种类数量与日俱增，物证鉴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厦门市公安局创新物证“一站式”鉴定，实现物证鉴定让民警从原来的“至少跑两趟”到如今的“一趟不用跑”。

现在，办案民警只需在系统内一键发起鉴定任务，鉴定机构即刻上门取件，后续系统将自动按流程高效运转。截至目前，通过“一站式”鉴定委托送检案件1.3万余起。

“这是政府购买服务、借助社会力量进行涉案财物管理的一个重要变革。”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第三方机构相关负责人孙先生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该项目注重定制化开发，整个数据库独立运行，同时配备了专门的管理团队、流程和场地，‘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些措施确保了项目的高效运行和管理的专业性。”

厦门市公安局民警指导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日常管理。 厦门市公安局供图

针对备受关注的涉案财物管理信息安全问题，孙先生表示，涉案财物案件当事人基本信息不会被泄露，第三方机构会严格遵循有关要求进行操作。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已入库保管、流转处置涉案财物170余万件，规范处置125万件，包括返还、拍卖、变卖、销售等多种方式。同时，通过集中保管、清退多余保管箱等措施，节约了执法人员工作时间约15万个小时，节约财政资金约1亿元。

自2020年运行以来，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管理、处置刑事、行政案件涉案财物“零差错”，实现办案效率、执法规范“两提升”，执法风险、行政成本“双下降”。目前，涉案财物管理的“厦门模式”已在福建全省推广，并被财政部列为涉案财物管理改革试点地区。